

第一章

中国传统音乐理论

周青青

第一节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历史

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这一专业的研究范围很广，包括：宫廷音乐、文人音乐、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，其中民间音乐又包括民间歌曲、民间舞蹈音乐、说唱音乐、戏曲音乐和民间器乐。

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的研究手段分为实地考察和案头工作两大类，包括中国传统音乐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。

从史料上看 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对于民间音乐的搜集、整理工作。

一、古代民间音乐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

1.《诗经》原名《诗》 西周到春秋时期 公元前 11 世纪 ~前 6 世纪) 的诗歌总集。汉时独尊儒术，把它作为儒家经典之一，称《诗经》。全书 305 篇 分为“风”、“大雅”、“小雅”、“颂”4 部分。《诗经》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，保留着古代诗歌、音乐、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。后来乐谱的舞姿失传 只剩下歌词。其中“风”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 大多数是民歌 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。“风”包括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等 15 国风 共 160 篇。其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数量最多，另外还有一些表达了人

民对统治者的怨愤、不满和反抗情绪 揭露、讽刺诸侯的荒淫无耻 以及歌唱劳动的内容。周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，称“行人”他们四出采访、收集民歌 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、政治得失。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，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，大约相当于今天黄河流域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四省及长江流域的湖北北部和四川东部。《诗经》的编者，一说是孔子，另一说为周代的乐工。

2. 《古今风谣》明代杨慎编纂的古代民谣集。杨慎（1488~1559年），明代文学家。少年聪颖 11岁能诗。正德六年（1551年）殿试第一 授翰林院修撰。禀性刚直 每事必直书。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众臣因“议大礼”违背世宗意愿受庭杖 杨慎 谪戍云南永昌卫，居云南 30余年 死于戍地。

杨慎的创作对文、词、赋、散曲、杂剧、弹词都有涉猎 考论经史、诗文、书画 以及研究训诂、文学、音韵、名物的杂著 数量很多。据《四库全书总书目》，《古今风谣》共 2卷，成书于明代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年）。收录自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古今民谣 280余首，为中国较早的民间歌谣专集。编者博览群书，广为采撷，从先秦古籍及历代有关文献中 搜罗摘引时谣、童谣、韵语和注文 以古籍传引的先后为序 加以编排。《古今风谣》收入《函海》及《艺海珠尘》。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编者据《艺海珠尘》本将《古今风谣》、《古今谚》及《粤风》重新排印为一册刊行。

3. 《山歌》明代民歌专集，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编纂。冯梦龙（1574~1646年）明代通俗文学家、戏曲家。出身士大夫家庭 少年富才情 博学多识 为同辈所钦服。为人旷达 治学不拘一格 行动也每每不受名教束缚 但他自早年进学以后 屡考科举不中 落魄奔走 曾以坐馆教书为生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冯梦龙被阉党迫害。这时他发

愤著书 完成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的编纂工作及《古今谭概》、《太平广记钞》、《情史》等大量评纂工作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取得贡生资格，任丹徒县训导，七年升福建寿宁知县。十一年秩满离任，归隐乡里。晚年仍从事小说创作和戏曲整理研究工作。

冯梦龙酷爱李贽^①的文学主张，深受其影响。他明确指出：“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，孰知情为理之维乎？”（《情史》卷一《总评》）“开主张‘乡国天下，藹然以情相与’”（《情史序》）反对用存天理、去人欲的理学传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文学上，冯梦龙认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：一种是出自田夫野竖之口的真文学，一种是荐绅学士乐道的假文学。只有自然地发于中情的文学，才算真文学，才能表达人的性情。《诗经》是善达性情者，而自六朝以来，诗被用以“见才”、“取士”和“讲学”，便流于陈腐，不能再很好地表达人的性情了，于是演变为词，词增损为曲，套数，曲浸淫为杂剧、传奇戏曲。文学的发展，文体的变化，“固亦性情之所必至也”（《步雪新声序》），当曲不足以表达人的性情时，“势必再变而是《粉红莲》、《打枣干》矣”（《太霞新奏序》），他认为人的性情是推动文学发展变化的力量，某种文学一旦成了说教工具，它就会僵化，遂被另一种能够表达性情的文学所取代。而文学的更迭过程，就是田夫野竖不断创新、新兴的活文学取代陈腐的死文学的过程。

冯梦龙在诗文、小说、戏曲上都有一定成就，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通俗文学、民间文学的搜集、整理和介绍上。除《山歌》外，还搜集、编辑了民歌俗曲集《挂枝儿》（又名《童痴一弄》），《山歌》共10卷，收吴歌365首，桐城时兴歌24首，是冯梦龙按“情真”的标准选人的，基本上是反映男女爱情，特别是私情生活的作品。冯梦龙冒着被攻讦的危险将它们编印成册，使之广泛流传，是因为这些作品均为“民间性情之响”，“天地间自然之文”，“若夫借男女之真情，发名教

之伪药 其功于《挂枝儿》等(《山歌序》)书前编者所写的《叙山歌》及书中的大量评注,对民歌的特征及其发展历史,它的价值与社会作用做了扼要的阐述,并表达了编者的民间文艺思想。他在评注中提出民歌整理要遵从民间文艺作品的原貌,这一观点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编选工作具有意义。《山歌》失传已久,1934年上海传经堂主人在徽州访得原书,经顾颉刚校点后排印出版。随后上海中央书店又据传经堂本加以增补收入《黄山谜》中。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以郑振铎旧藏明天启、崇祯年间的写刻本为底本,重新校点排印。这个本子较前两种更为接近原貌。

4.《古谣谚》辑录古代民谣和谚语的专书,清代杜文澜辑。全书100卷其中正文85卷附录14卷集说1卷。把大量古籍中保存的上古至明代的谣谚汇集成编,在宋代以来同类书中堪称集大成之作。对于歌谣,根据古代有徒歌与合乐的分别,只收属于徒歌的谣。

《古谣谚》全书所收作品按性质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大量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流传的普通百姓、劳动者和少数民族的作品,另一类是古代帝王、名臣、文人、僧道的个人创作。《古谣谚》在作品正文之外兼收异文(列于附注)对每一作品产生、流传的原委、原书引用时有关的上下文,一一予以叙录,或加以考辨。如关于明末李自成起义民谣各种异文产生和传播的经过,两广瑶族反对官府谣有关的地理情况,苏州民颂扬清官况钟的始末,《芝麻谚》有关的民俗观念等等均有记载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。书前有刘毓崧在咸丰辛酉年(1861年)写的序言关于谣谚颇有一些精辟见解。《古谣谚》“凡例”17则论述了古代谣谚的本义,分析了古籍中谣谚的种种名称和创作时的复杂情况,确立了比较严格的辑录标准和编选原则。该书第100卷集中了古人关于谣谚的论述80多则内容涉及谣谚的定义、特点谣谚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作用,古代关于采风的记述,以及统治阶级对歌谣的诋毁

等等，是歌谣谚语研究的重要资料。

5. 《粤风》清代广西各民族民间情歌集，清李调元集解。李调元（1734~1803年）清代文学家、戏曲理论家，历任吏部文选司、广东学政、直隶通永兵备道。后在直隶通永道任上，因弹劾永平知府反遭诬陷，发遣伊犁，到1785年才以母老赎归。晚年潜心著述。李调元喜爱民间文艺，尤其是地方小戏及其他戏曲，著有戏曲理论著作《曲话》、《剧话》，是研究戏剧史的重要资料。他对当时蓬勃兴盛的吹腔、秦腔、二簧腔、女儿腔等民间戏曲十分重视，对它们的起源和特征做了介绍，并对弋阳腔与高腔的形成发展做了细致的探索。

《粤风》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各民族民间情歌专集。《粤风》收入李调元所编的《函海》丛书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首次付印。编者意欲用它“补三百篇之遗”。歌集收汉族，主要是客家，情歌53首、瑶歌23首、侗歌29首、壮歌8首，分别编为粤歌、瑶歌、侗歌、壮歌4卷，每卷卷首署有原辑者的名字。后3卷少数民族的情歌，用汉字标音记录，并详加注释，部分歌句还有意译。对全首民歌的内容和形式，也偶有评论。对粤歌卷中的蛋歌、沐浴歌，粤地一种说唱片段，瑶歌卷中的布刀歌，侗歌卷中的扇歌、担歌，有较详细的题解与说明。集中所收情歌，歌词大胆直率，感情质朴真切，语言富有民族特色。有的还涉及到少数民族进山踏歌的风俗，以及歌仙刘三妹和梁祝传说等内容。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以及民间文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均有参考价值。

6. 《霓裳续谱》清代中叶以前的俗曲总集。颜自德（天津三和堂曲师）选辑，王廷绍编订。刊行于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8卷，选录当时流行于北京、天津的时调小曲，计有〔西调〕、〔岔曲〕、〔南叠落〕、〔寄生草〕、〔黄沥调〕、〔剪靛花〕、〔叠落金钱〕、〔玉沟调〕、〔番调〕、〔马头调〕、〔扬州歌〕、〔北河调〕、〔隶津调〕、〔盘香调〕、〔莲花落〕、〔秦吹腔〕

花柳歌]、[一江风]、[倒搬桨]、[银纽丝]、[玉娥郎]、[劈破玉]、[打枣杆]、[弹簧调]、[边关调]、[秧歌]、[螺蛳转]、[重叠序]、[粉红莲]、[呀呀哟]、[两句半]等 30 多种曲调,包括单曲体和联曲体的曲词 619 支。

《霓裳续谱》选录的曲词题材广泛 内容以民间情歌居多 另有据传奇剧本改写的,以及描写民间风俗的作品。其中有的出自文人墨客之笔,也有民间歌手和艺人的创作。书中所选的岔曲,已有平岔、慢岔、数岔、西岔、起字岔、垛字岔及联缀曲牌的牌子曲和平岔带戏等多种形式。对于研究清代中叶以前南方曲调传入北京的情况,当时时调小曲和岔曲的情况,以及清代的民俗等,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7. 《白雪遗音》清代中叶的俗曲总集。 [清]华广生编。乾隆九年(1804年)编订,道光八年(1828年)刊刻。据编者序文说,书中的曲词,是经过多方搜罗、友人函递辑录而成。采录的地域以山东为中心,遍及南北各地。全书四卷,以[马头调]的曲词最多,并于[马头调]作品之前附有工尺(未点板眼),此外,还有[岭儿调]、[满江红]、[小郎儿]、[南词]、[九连环]、[剪靛花]、[七香车]、[起字呀呀哟]、[八角鼓]等共 10 种曲调,包括单曲体、联曲体及[南词]选段的曲词共 733 首。曲词题材范围广泛,以写男女爱情的居多,另有小说、戏曲人物故事和写景的作品,也有笔墨游戏之作。作品的形式,除时调小曲外,还有满族旗籍子弟编写的八角鼓,大部分是岔曲,有些至今还在传唱。南词部分,除收开篇唱词 107 段外,还有选自《占花魁》的《醉归》、《独占》2 回,选自《玉蜻蜓》的《戏芳》、《游庵》、《显魂》、《问卜》、《追诉》、《访庵》、《露像》、《诘真》、《认母》9 回。对研究清代的时调小曲,以及清代曲艺史均有参考价值。

8. 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戏曲史料汇编。中国戏曲研究院编,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出版,1982 年重印,全书 10 册。收录唐、

宋、元、明、清 5 个朝代的戏曲论著 48 种 其中探讨戏曲创作、评述或考证作家及其作品的 16 种，记录各时代作家及曲目的 13 种，专论戏曲音韵、曲谱及制曲的 4 种，论述教坊佚闻、唐代俗乐、曲牌来源、律吕宫调、声乐理论及演唱方法的 13 种，记述元代戏曲演员身世、生活与伎艺的 1 种，总结古代戏曲表演艺术经验的 1 种。其中有〔唐〕崔令钦《教坊记》、〔唐〕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、〔宋〕王灼《碧鸡漫志》、〔元〕燕南芝庵《唱论》、〔元〕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、〔元〕钟嗣成《录鬼簿》、〔明〕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、〔明〕徐渭《南词叙录》、〔明〕李开先《词谑》、〔明〕王世贞《曲藻》〔明〕王骥德《曲律》、〔明〕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、〔明〕徐复祚《曲论》〔明〕凌濛初《谭曲杂劄》、〔明〕魏良辅《曲律》、〔明〕沈宠绥《弦索辨讹》和《度曲须知》、〔清〕李渔《闲情偶寄》、〔清〕徐大椿《乐府传声》、〔清〕李调元《雨村曲话》和《剧话》、〔清〕刘熙载《艺概》等等。

这部戏曲史料丛刊还对每一部论著都编写了“提要”，扼要介绍作者生平、论著内容和版本流行情况。由于它按照时代顺序编写，大体可以看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和艺术成就。

除上述主要著述之外，还有清代琵琶演奏家华秋苹编《借云馆小唱》收牌子曲谱 10 首（1818 年）贮香主人编《小慧集》收民歌曲谱 15 首等。

二、近代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活动和著述

这里所说的“近代”指自 20 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。这个时期，出现了一批研究民间音乐的团体和个人。

1. 歌谣研究会中国现代第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团体。1920 年在北京成立。在五四运动提倡平民文学，反对贵族文学，努力吸收西方进步文学的影响下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^②发表启事成立“歌谣征集处”，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。当时北大的进步教授刘半农^③、沈尹

默、周作人^④任编辑 钱玄同、沈兼士考订方言。同时发表“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”在“北京大学日刊”、《新青年》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武汉、广州等地的报纸、刊物上发表 影响很大。从 1918年 5月 20日起 在北大日刊上开辟“歌谣选”栏 每天刊登一则 由刘半农编选并作考订说明 共出 148则。

1920年 12月 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 由沈兼士、周作人做主任，继续征集中国近世歌谣。1922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国学门，歌谣研究会并入其中。因征集材料不够，歌谣研究会决定创办《歌谣周刊》，继续广泛征集各地歌谣并展开对歌谣的研究。

1923年 1月 30日歌谣研究会决定扩大收集范围，除歌谣外，还要收集、研究神话、传说、童话故事、风俗、方言等资料 向民俗学方面扩展（民俗学是民间音乐研究的边缘学科）。1923年 5月 24日成立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，不久又组织和发动歌谣研究会、风俗调查会会员进行了妙峰山、东岳庙、白云观和财神殿的民俗调查。

在对歌谣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的深入过程中，《歌谣周刊》开始对方言、方音等问题进行讨论。在此基础上 1924年 1月 26日成立了方言调查会（方言学也是民间音乐研究的边缘学科）。

到 1925年 6月，《歌谣周刊》共出了 97期 增刊 1期 发表歌谣 2226首。除新疆、西藏、热河外 各地民歌都有 其内容以反映妇女痛苦生活的歌谣和儿歌为多 也有不少情歌、仪式歌（喜歌、丧歌等）长工歌、劳动歌、时政歌谣等。发表的歌谣汉族的最多 也有壮、彝、藏等少数民族歌谣。在形式上以只说不唱的民谣和曲调自由的山歌、小调为主。周刊还注意异文的搜集和研究，在创刊号上即刊登几首同一母题的歌谣 以后陆续刊登这类作品 例如《看见她》、《月光光》、《张打铁》等各地流传的异文。周刊所发表的文章多从文学、语言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等角度对歌谣进行探讨和叙述。如常惠《我们为什么要研

究歌谣》、刘经菴《歌谣与妇女》、郑宾于《歌谣中的婚姻观》、刘半农《海外的中国民歌》、张四维《云南山歌与彝歌》、顾颉刚^⑤《孟姜女故事的转变》、董作宾关于《看见她》的比较研究、钟敬文^⑥《歌谣杂谈》等。在两年半的时间里，共发表歌谣 2226 首 文章、讨论、通讯、译著 111 篇，成为当时全国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的中心。1925 年 10 月“研究所国学门周刊”创刊，继续发表歌谣故事等材料和有关理论文章。

歌谣研究会还出版了“歌谣丛书”顾颉刚《吴歌甲集》“歌谣小丛书”一种 董作宾《看见她》“故事丛书”一种 顾颉刚《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》。1927 年 歌谣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顾颉刚、董作宾、钟敬文等人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，北大歌谣会停止了活动。歌谣研究会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征集到全国 22 省的各种歌谣 13908 首。

1935 年在停顿了近 10 年之后，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 聘请胡适^⑦、魏建功、顾颉刚等人为歌谣研究会委员。《歌谣周刊》从 1936 年 4 月复刊 到 1937 年 6 月共出 53 期，研究的方向侧重文学和文艺学，许多论著至今在学术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2. 《中国歌谣》朱自清^⑧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时的讲义 先后有油印、铅印两种本子 题名为《歌谣发凡》和《中国歌谣》。1957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作者原计划编写 10 章 结果只完成 6 章 即：(1) 歌谣释名；(2) 歌谣的起源与发展；(3) 歌谣的历史；(4) 歌谣的分类；(5) 歌谣的结构；(6) 歌谣的修辞。

3. 王光祈^⑨ (1892~1936 年) 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。20 年代初留学德国，先学经济，后人柏林大学音乐系专攻音乐学。柏林大学是比较音乐学最主要的策源地和中心，施通普夫 (Kral Stumpf, 1848~1936 年) 和霍恩博斯特尔 (E. M. V. Hornbostel, 1877~1935 年) 是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第一代创建人。王光祈接受柏林学派的影响 想通过中 东 西方音乐的比较研究 找到复兴中国和东方文明的

办法。他最有代表性的论著是《东西乐制之研究》（1924年成书，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）和《东方民族之音乐》（1925年成书，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）。王光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本位立场，对（东）西方音乐的比较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根据不同民族的音阶、音律（乐制）的异同，提出世界“三大乐系”的学说。

4. 《西南采风录》 30年代末西南地区歌谣的选集。刘兆吉编，194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1937年秋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南迁至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。1938年1月，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，成立西南联大。其中300多名有志于社会文化考察的师生组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从长沙步行到昆明。旅行团成员就各人所攻专业和爱好，编成各种考察和研究组织，民间歌谣组即其中一个考察组。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等参加，并由闻一多^⑨担任该组工作指导人。步行团自长沙至昆明，共行3000多里，经过3个省会，27个县城，大小村落1000多个。刘兆吉在沿途利用各种机会采集流行在民间的歌谣，68天中共记录各类歌谣2000多首，从中选出771首编成此书。书前有朱自清、黄钰生、闻一多分别写的序言，还载有编者所著《歌谣区域的方音与国音之比较》。本书歌谣按6类排列，即情歌、儿歌、抗日歌谣、采茶歌、民怨、杂类。

5.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前身是1939年3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成立的“民歌研究会”，1940年10月改名“中国民歌研究会”，1941年2月又改名为“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”。成员多为该院音乐系师生，以致力于民间音乐的收集、研究为宗旨。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，解放区的民间音乐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，1942年8月该会召开第五次全体大会，选举吕骥、安波、马可、向隅等为理事，吕骥为主席。曾出会刊《民间音乐研究》一期（1942年），编印民间音乐资料丛刊多种，如《秧歌曲选》（焕之、刘炽、马可、张鲁等编，1944年），《陕

甘宁边区民歌》第一、二集(焕之、李元庆、杜矢甲、唐荣枚、马可等编, 1944年、1946年),《秧歌锣鼓点》(焕之、徐徐等编, 1945年),《眉户道情集》(焕之、恒之、刘炽等编, 1945年),《河北民歌集》(孟波编, 1945年) 筹。其会员所写论文有《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》(吕骥)《民歌中的节拍形式》(吕骥)《秦腔音乐概述》(安波)《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》(马可 筹 均收入《民间音乐论文集》(1948年)。

吕骥于 1941 年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写的《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》(原载 1942 年《民间音乐研究》创刊号 以后又发表在 1948 年出的《民间音乐论文集》, 1962 年 5 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的《民族音乐》参考资料之二 的《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》一书中 以及广东的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》 1981 年第四期和《音乐研究》 1982 年第二期上, 80 年代以后发表的是修改稿) 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: 一、研究目的(为新音乐的参考); 二、研究的原则和方法(从内容出发, 了解民间音乐的形式和技术 并为音乐实践服务); 三、民间音乐的范围(民间劳动音乐、民间歌曲、民间说唱音乐、民间戏剧音乐、民间风俗音乐、民间舞蹈音乐、民间宗教音乐、民间器乐音乐); 四、应该研究的问题。第四方面, 可以作为本学科研究课题的一个大致概括。分为两部分。

(一) 一般的理论问题

- (1) 民间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, 及其对于人民思想感情的影响;
- (2) 从民间音乐所见到的中国人民的生活、思想及感情, 各族人民表现思想、感情的不同方法与表现形式;
- (3) 从民间音乐中所见到的人民的审美观点、民族语言和方言对于音乐的影响;
- (4) 民间宗教、风俗与民间音乐的关系和相互影响;
- (5) 各时期宫廷贵族音乐与民间音乐的相互影响及其不同的审

美观；

(6) 外族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，从中观察不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时代特色；

(7) 各种民间音乐的分布现状、相互关系及历史上流传演变与民族迁徙的关系；

(8) 各地各种民间音乐的相互关系与影响；

(9) 各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与改革方面的问题。

(二) 专门的技术问题

(1) 各种民间音乐的音阶、调式、音律以及其曲调构成的研究；

(2) 各种民间音乐的曲体形式及节奏构成的研究；

(3) 各种民间音乐的演唱技术与表演技巧的研究，特别是与各方言感情音调之间的规律性问题；

(4) 民间乐器流传发展历史与演奏技术、流派特点历史发展的研究；

(5) 民间乐队的组织形式与各种民间乐器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，乐器与乐队的特殊音色所反映的审美观；

(6) 民间音乐的传统记谱法（包括声乐中的假声、各种装饰音的记谱，吹乐器中的特殊吹奏法，弦乐器的特殊指法与弓法，各种打击乐器的各种特殊音色的演奏法与各种特殊节奏的记录法等），各种记谱法的发展历史以及记谱法改革的研究。

6. 杨荫浏^①（1899~1984年）我国音乐史家、民族音乐学家。1941~1949年在重庆、南京任国立音乐院教授，讲授中国音乐史、国乐概论等课程，并于1942~1944年发表文章《国乐前途及其研究》（《乐风》杂志，《中国音乐学》1989年第4期）在这篇文章中，他提出：“国乐的独到的价值，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，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，国乐的充分发展，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之

后 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。”但是“交融的不同文化因素 因交融以前各因素，独立基础的强弱，和它准备工夫的充分与否，会形成种种不同的交融结果。……以国乐而论 当前的情形是如此 我们自己还没有充分准备，世界音乐的力量却已非常强大。我们若再不准备，便只有让整个世界音乐，逐渐地来淘汰和排挤了这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。因此 我们必须准备。但准备的当儿少量的渐次的发见、归纳和发展，似乎很难抵挡得住世界音乐磅礴的潮流。因此，这样畸形的环境之下，我们应当给与国乐过度的注意。”对于国乐和西方音乐理论建树上的区别，杨荫浏做了非常中肯的评价：“谁都觉得研究西方音乐的便利：史实方面，有种种详简不同的通史，有各个音乐家详细的传记，更有包罗万象的音乐大辞典和百科全书；曲调方面，有的依时代分别 有的依作家分别 有的依技术为单位 有的以曲体为单位 有的从程度的高低着想，有的从应用的范围着想……有专书，有总集，有单行本 只要有钱 人人都能买到 理论方面 记谱、制调、和声、对位、‘卡农’、‘飞格’、配器等等 多少均有一定不易的原则为音乐家所公认，所共遵；甚至对古代曲调的和声方法等等也有专书，足供学者的参考。著名作品 大都灌有整套的留声机片 使学者可以按谱听反。偶有一二新进作家，制成了一二有价值的曲调，便引起音乐批评界热烈的反应，而不久之后，新版的音乐史中也许便加入了关于他们的记载 他们的作品 也许已经制版印刷 在社会上不胫而走。他们音乐创作的合理产生，一部分、可以说是过去他们对于音乐史料的研究，透彻详明的结果。他们音乐史料，所以研究得如此透彻详明，实在又是过去多少努力研究 分析 归纳的结果。”西方各国 地域大多比我国狭小 历史大多比我国简短 音乐史料的整理工作 比较容易做。看看我国是怎样？历史有五千年的悠久，地域有一千一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；复杂的民族、多次经过外来文化的沟通和融化，音乐的内容

是何等的不易整理!”国乐的园地,是非常的广大,并不是某一类音乐某一种曲调,某一派技术和理论所可以代表的。这些史料,严格地讲来,可以说都还未曾经过合理的开发。……理想中应加研究的材料太多,我们目前所看见所知道所了解的太少。人家的史料,几乎近至现在的一刻,都有即时列入系统的可能。我们的史料,却有好许多,还散在民间,在奏唱者的乐器上、歌喉中,连书面的乐谱,都未曾有过。所以我们在国乐方面,现在与较近的将来,所不得不做的,是搜罗、分析、比较、归纳等工夫。”直到今天,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过了半个世纪。杨荫浏先生所指出的状况,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,但还有很多传统音乐需要去做“搜罗、分析、比较、归纳等工夫”。

7. 重庆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四七届同学于 1946 年发起成立“山歌社”,宗旨是“以集体学习方式收集及整理民间音乐,介绍西洋进步音乐(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),普及音乐教育,提高音乐水准,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”。社长是郭乃安,社员多数为作曲家和作曲理论家,研究成果有与创作紧密结合的特点,如王震亚的《五声音阶及其和声》(1946 年油印出版,1948 年上海文光书店出版)和配有钢琴伴奏的《中国民歌集》(1945 年油印出版,1949 年上海中华乐社出版),理论方面编有《山歌通讯》和《西南日报》副刊《山歌》。

8. 与此同时,还有一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:童斐(1865~1931 年)的《中乐寻源》(商务印书馆 1926 年出版)论述我国古典音乐和传统歌唱艺术;刘天华(1895~1932 年)的《我对本社指国乐改进社,1927 年创办计划》(1927 年 8 月《国乐改进社成立刊》)以及刘天华用五线谱和工尺谱准确记录的《梅兰芳歌曲谱》(1930 年)搜集的《安次县吵子会乐谱》《佛曲谱》张亚雄《花儿集》(青年书店 1940 年出版),上编为作者赏析、评介性文字,下编收录花儿歌词 600 余首。

9.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编的《中国现

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》(《民族音乐》参考资料之二 编选者孙幼兰、黄翔鹏、吴毓清等,1962年7月第1版)收有1917~1949年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章。全书分为三个部分:

(1) 戏曲音乐论文选——如刘半农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张厚载《新文学及中国旧戏》、《我的中国旧戏观》欧阳予倩《予之戏剧改良观》正伯《皮黄的价值》熊佛西《国剧与旧剧》张庚《音乐在戏剧中的作用》等。这些文章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中国戏曲,其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。

(2) 民族音乐论文选——如萧友梅《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》、《对于大同乐会拟仿造旧乐器的我见》、《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》,陈仲子《欲国乐之复兴宜通西乐说》王光祈《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》、《翻译琴谱之研究》、《〈中国音乐史〉自序》刘天华《〈梅兰芳歌曲谱〉编者序》青主《论民歌》、《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》黄自《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》、《聂耳日记》陈洪《国乐的定义》丁冬《对于中国音乐的感想》,贺绿汀《中国音乐界的现状及我们对于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》冼星海《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》、《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》、《论民歌研究》吕骥《民歌的节拍形式》、《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》赵沅《音乐的民族形式》夏白《关于四川的民谣与民乐》马可《戏剧音乐的阶级性》音乐学习社《民族音乐讨论提纲》钱仁康《论民歌》。

(3) 1949~1959年民族音乐论文参考目录。

10. 两部戏曲史论著:

(1) 《宋元戏曲史》一名《宋元戏曲考》编著者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^⑩。该书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带有总结性的巨著。此前4年间他完成了《曲录》、《戏曲考源》、《录鬼簿校注》、《优语录》、《唐宋大曲考》、《录曲徐谈》和《古剧角色考》等著作对历来被认为

“文格卑俗”的戏曲做了高度评价。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 王国维系统论述了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，对现存的元杂剧作家和作品，做了重点和精到的论述。这些 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。因此 被郭沫若称之为“拓荒的工作 前无古人 而且是权威的成就”（《鲁迅与王国维》），《宋元戏曲史》共 16 章 以宋、元两朝为重点 征引历代有关资料 说明其源流演变。对形成戏曲艺术的各种艺术因素 从古优、巫观 汉唐歌舞百戏、滑稽戏 到宋金院本、各种乐曲、说唱文学、小说、傀儡戏、影戏等 逐一考证它们的来源、内容、表现形式和艺术特点 从各种艺术的继承发展联系中，阐述了戏曲艺术孕育形成的过程。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专著，材料丰富，治学态度严谨，其中有些见解（如关于杂剧的历史分期）为研究界长期沿用。《宋元戏曲史》写成于 1912 年底 1913 年初，主要版本是民国四年 1915 年的《文学丛刻》本。1996 年东方出版社重印。

(2) 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〔日〕青木正儿著，成书于昭和五年（1930 年），1933 年上海北新书店曾出版郑震节译本。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王古鲁的译本，195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译者的“增补修订本”，1958 年又由作家出版社重印。著者自序写此书的目的是想作为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》的续编，原欲题名为《明清戏曲史》。著者认为，宋代是戏曲史的古代期，元代为中世期，明清为近世期 遂用现名。全书五篇 16 章 第一篇“南戏北剧之由来”叙述宋以前戏剧发展之概略，南北曲的起源和分歧。第二篇“南戏复兴期”，论述自元代中叶至明正德年间的南戏，以及固守元曲余势的明初杂剧。第三篇“昆曲昌盛期”，论述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的昆曲 又细分为昆曲的勃兴时代、极盛时代（前期）、极盛时代（后期）、余势时代。第四篇“花部勃兴期”，论述自乾隆末至清末花部之勃兴与昆曲之衰退。第五篇“余论”，论述南北曲之比较，剧场之构造及

南戏之角色 沈璟之《南九宫十三调曲谱》与蒋孝之“九宫”、“十三调”二谱的关系。

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“文革”前的主要课题与著述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有了比较好的发展条件，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

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“民族音乐研究部”^⑬。在此前后，一批以“民族音乐”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在各地成立，如东北鲁迅艺术学院 1949年和上海音乐学院 1952年的“民族音乐研究室”等。这些机构将民族音乐的研究纳入课堂教学，并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，包括音响资料、调查报告、教材、论文和论著。

50年代，于会泳^⑭提出把“民族音乐理论”分为“纵向研究”和“横向研究”两大部分。“纵向研究”包括“民间歌曲研究”、“民族器乐研究”、“戏曲音乐研究”、“曲艺音乐研究”等四门属于门类性质的研究；“横向研究”是在“纵向研究”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专题研究，所以又称“综合研究”，包括：“腔词关系研究”、“句式研究”、“结构规律研究”、“宫调研究”、“唱腔与伴奏关系研究”、“润腔研究”等。他强调，“民族音乐理论”专业的学生必须有“两个四大件”的扎实基础，即上述“纵向研究”的“四大件”和西方作曲理论的“四大件”^⑮。

这一时期主要的音乐学术期刊是《人民音乐》（1950年创刊）和《音乐研究》（1958年创刊）。当时主要的研究课题是：

1. 民间音乐的搜集和整理

这时有大量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介绍文章，如叶林《苏南松江分区一带的小调民谣研究》、山雨《湖南资江文工团民歌采集工作记》（《人民音乐》1950年9月创刊号）、赵纪舜《云南圭西山歌舞》、李佺民《贵州苗族的芦笙》、王树《内蒙民间音乐略述》（《人民音